

特稿

创建传统，彰显特色*

——新中国阿拉伯语专业一甲子谈

朱威烈

摘要：本文梳理了中国阿拉伯语专业自1946年迄今的成长历程，阐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阿语专业建设的成就和特色，并对新世纪阿语专业的发展作了高屋建瓴的展望。尤其强调，新中国高校阿语专业已超越传统宗教语言范畴，正式成为中国外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学科内涵得到了不断拓宽。

关键词：新中国；阿拉伯语专业；学科传统与特色

作者简介：朱威烈，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09）05-0003-07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B702资助。

新中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发展建设60周年了，这是中国阿语专业走出传统宗教语言范畴，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为中国外交、中国改革开放需要服务，正式成为中国外语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断拓宽学科内涵的60年。我自1960年进入北大东语系阿拉伯语科学习至今，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离开过或作为专业或作为工具的阿拉伯语。它不仅是我的学术出身，一种身份，贯串着我的教学研究生涯，而且也是我为祖国效力、为社会服务的一项事业，一个重要的工作领域。

光阴荏苒，逝者如斯。静时抚今追昔，感念之人甚多，感触之事也不少。倘若要就阿语专业的发展谈点憬悟所得，结合当前实际，想到的有两点，即要保持并发扬重需要、重质量的传统，要坚持并珍视学科的交叉融合、开拓创新的特点。

中国高校阿语专业历经60年的发展，应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其突出的要点，一是始终重视适应需要，二是讲求提高质量。作为高校一门新兴的外语专业，阿语教育的发轫、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的需要，离不开新中国建设的需要。

一、中国阿拉伯语专业的发展历程

现在，大家都已公认，中国高校设立阿拉伯语专业，乃始于“1946年，迁至云南的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汤用彤教授筹建东方语言文学系，经向达教授和白寿彝教授推荐，马坚被聘为北大教授，在东语系开设阿拉伯语专业”^{[1]104}。至于北大为何要建阿拉伯语专业，我是近年看到《中国近

现代外语教育史》才恍然的。此书在“西南联合大学”一节中，提到了时任该校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的冯至先生《关于调整大学中文外文二系机构的一点意见》一文，文中同意“闻一多等提出的把中国文学系（文学组、语言学组）与外国语言文学系，改为文学系（中国文学组）与语言学系（东方语组、印欧语言组等）”。冯先生说：“将来的语言至少要有两组：印支语言组与印欧语言组；如果有阿拉伯语，则须设有闪含语言组……。”^{[2]159}可见，起意、考虑开设闪支语言、阿拉伯语等东方语的，乃是源自历时仅9年（1937~1946年），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辉煌一页的西南联大，出于那些学贯中外、举国闻名的教授对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建设的前瞻性创见。这也印证了季羨林教授后来的回忆：“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创办，完全是因缘和合的结果。大概北大早就有建立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学系的想法。”^{[3]305}到1946年，合乎西南联大教授和校院领导办学标准的人才终于出现。一是已在德国学成的季羨林，由陈寅恪教授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推荐，到北大任教；二是马坚，由汤用彤院长出面延聘，让他随同在昆明的北大师生一起抵北平，在北大东语系开设阿语专业，从而开辟了我国阿语教育的新时代。

上述阿语进入中国高校教育体制从缘起到落实的过程，反映了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精英的学术视野和办学理念。当时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课程，以英语和英国文学为主，但也为本系和全校各系开设第二、第三外语，包括法语、德语、俄语、日语，此外还开设过梵文、拉丁文、希腊文作为选修课程。闻一多、冯至等先生提出办东方语、印支语、阿拉伯语、闪含语等设想，应该是基于他们对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考虑，之所以能在1946年变成现实，是因为胡适、傅斯年、汤用彤等校院领导认同这种需要，给予了支持。只是阿拉伯语专业初创的几年，正处在解放战争时期，其困难和艰辛是不难想见的。

新中国建立前后，阿拉伯语专业随即出现发展机遇，这与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1912~1992年）直接有关。据季羨林教授回忆，1949年春夏之交，他收到当年清华同学胡乔木的信，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文的人才。他问我是否同意把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的一部分和边疆学院合并到北大来。我当时就同意了。于是，我们这个全校最小的系，一变而为全校最大的系”^{[3]323-324}。季老把这个消息称为“一件天大的喜事”，“一个好机会仿佛自天而降”。对阿语专业来说，合并的结果，是形成了一支全国一流的师资队伍，使招生、教学等学科建设，都步入了正轨，开创出一个蓬勃向前的发展局面。另一次也是季老追述的：“我的清华老同学胡乔木同志去看我。他告诉我说：‘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泽东先生看了他那两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和《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由此可见，马坚先生在解放初期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4]季老没有说胡乔木去看他的具体时间，从谈话中提到的马坚先生的两文看，前者在1951年1月1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后者刊登在1951年3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胡乔木的口信，当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传达的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看法。用今天的视角看，是作为学科带头人的马坚教授，他的研究成果，做到了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符合当时国家方针政策的需要。

从建国初期至“文革”之前，国家的这种需要，在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指示和教育部门的规划、纲要等制度性建设文件中，都有明确突出的反映。周总理在1956年1月14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语书籍的翻译”^{[5]186}。这是在建国初期“全面学习苏联”，大规模发展俄语教育后出现的一个转折点，使西方语言（尤其是英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外语教学立即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此后，为适应国家对外语师资和外交外事人才的迫切需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利用各种场合，特别是到外语院校去讲话，反复强调要下苦

功夫学好地道外语，“能够讲很好的英文、俄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或其他语文，使他们能够写、能够说、能够翻译、能够利用外语作各项学科的研究，把外国有用的经验介绍进来……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好，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第一流的强国”^{[2]237}。可以说，那时学习外语，属于国家急需的教育工程之一，对学生来说，也是一项重要而光荣的使命。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迅速拓展，在国家领导人的持续推动下，1964年10月，高教部会同其他部门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份重要的指导性文件，而且对今天的外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纲要》在回顾总结新中国外语教育成绩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专业外语与公共外语，学校外语与业余外语，高校与中学的语种比例与规模，以及提高质量等四个方面的方针。其中的量化指标十分具体，提出的举措也很务实，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各高校和各语种外语教育的制度化建设，明确了各自的任务目标和规范要求。

在这样的形势背景下，阿语专业的发展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数量上，先是1954年成立的北京外贸学院，接着是外交学院、上外、北外、解放军外语学院、北语和北二外，到1964年都设立起了阿语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面，从外交、教育部门迅速扩展到经贸、文化、新闻、出版、科研等许多领域，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为此，在上述《纲要》中，明确指出学习阿语的人数要适当增加，到1970年，全国的阿语教师应补充180人，足见国家需求阿语人才之迫切。

关于教育质量，则更是国家领导人和《纲要》等教育部文件始终予以高度关注、不断强调的重要目标。周总理指示外国语学院的办学要向“多语种，高质量”发展；陈毅副总理分管外交，对外语教育一直抓得很紧，讲话也最多。他在外语院校作报告时，提出“要学习地地道道的外语，达到文从字顺的程度”，“必须经过一番艰苦奋斗，废寝忘食，要不怕奇寒酷暑，大冷大热，都要奋斗，才能学好”，“古时候大学问家孔夫子读书‘发奋忘食’，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达摩祖师‘面壁九年’，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求学问的精神”^{[2]223, 241}。《纲要》则进一步对毕业生掌握的词汇量、听说读写的能力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事实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折腾人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哲学社会科学还根本谈不上什么解放思想，繁荣发展，只有外语教育可算是其中得天独厚的一枝，原因是国家对外关系的迅猛发展急需通晓外语的人才。尽管当时的需求主要侧重在技能方面，但对外语学科的基础教学毕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阿语专业的发展也因此起步阶段，就奠定了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基础，并形成了重视国家发展需要、重视教学质量的良好传统。“文革”前，我在北大上学，对教师们的敬业负责和同学们的刻苦好学，一直留有深刻印象。之后与其他高校的师生们来往，获悉的情况也基本相同，“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练好基本功，掌握地道外语”，是当时阿语专业的普遍价值取向，也是中国高校阿语专业传统中的重要内涵。

这种传统即便是在狂风恶浪的“文革”期间，也仍然沿袭了下来。那时，多亏周总理还在，他凭藉自己的世界眼光和国家责任感，不仅千方百计竭尽全力保护、保存了“文革”期间毕业的9500余名外语毕业生中的大多数，而且抓住了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尼克松访华两件大事，直接推动了部分外语院系恢复招生和派遣留学生的工作。

我在那时，曾教过1972年起开始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和办在安徽凤阳的外语培训班。他们入学时，我正在法汉词典组翻译《阿拉伯马格里布史》，不归系里管。听说是第一届学员曾向系里反映，要求我去上课，系里看到第二届两个班又将进校，人手确较紧张，遂把我调回系里。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其间包括下乡下厂劳动，整段整段的政治学习，实际学习专业时间还不到二年半。然而，他们大都很好学，也很尊重老师。我教工农兵学员的第一年，正碰上大批重业务、轻政治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回潮”。班里有学生把我当作对象，去向系里告状，还准备贴大字报，结果

遭到全班同学的痛斥和阻止。我至今对当时受到的这一难得的保护心怀感激。接着，我时隔五年后，又再次赴凤阳干校，任务虽仍是去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主要是去教第一届培训班。同学们的热情真诚，特别是他们求知若渴、发奋用功的精神风貌，是我难以忘怀的。尽管干校条件简陋、劳动也紧张，但这些不到 20 岁的青年人，没有人抱怨叫苦，没有人懈怠厌学，因为他们知道，国家需要阿语人才，需要他们学好本领为国家效力。整整一年，我一个人要教各种课，精读、泛读、语法、会话……要编选教材，包括下煤矿劳动的辅导读物，课余还带领他们翻译了一本外文社委托的连环画《江防图》。虽然忙累，但很愉快。同学们知道我第一次下干校时因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做过胃大部切除手术，对我很照顾，也没有人批评我“白专”或“修正主义苗子”。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学员和培训班学员学习时间明显不够，学习重点只能放在听说读写的技能方面，然而，他们学得很刻苦，语言基本功不错，其中有的毕业后又出国深造或攻读学位，成为了专家教授，也有的历经实践锻炼，担负起了涉外部门的重要职责。因此，在这些阿语学生身上，仍然反映出服从国家需要，不断追求向上的良好传统。

改革开放的 30 年，是阿语专业进入规范化建设的重要阶段。学制、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等教学的主要环节，都不断深化完善；教学研究会、教学指导组的组建，对各校的阿语专业发展，更发挥着重要的交流协调作用。阿语专业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基本跟上了英语、俄语等同类学科的步伐，拥有了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出现了博士后流动站，不少教材、论文、专著获得了省部级奖项。这些成绩的取得，应该是与阿语专业师生始终保持着适应国家发展和学科建设需要，保持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神，分不开的。

二、新中国阿拉伯语专业发展成就及特色

中国阿语专业教育队伍已经历了几代人。一般来说，以马坚、纳忠、刘麟瑞等为代表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老师，是第一代先辈，他们筚路蓝缕，开创基业，悉心传授所学，倾力扶植后学，居功至伟，可称楷模；第二代是新中国培养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优秀师资，如陈嘉厚、邬裕池、余章荣、李振中、归运昌、张甲民、杨孝柏、仲跻昆、孙承熙等，他们坚持教书育人，敬业奉献，与老一辈教师一起，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家急需的阿语人才，是那个时代的中坚力量；“文革”及改革开放时期毕业的阿语教师，是目前各校阿语专业的掌门人和教学骨干，其中部属重点高校的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都较合理，大都具有留学背景，视野开阔，充满活力，不但承担着今日教学科研的重任，而且肩负着未来铸造辉煌的使命。面对时代的进步和学科的变化，这一代阿语教师在推动阿语专业发展的过程中，既会有机遇，也得应对挑战，重要的是要正确识别、甄选阿语专业 60 年来已经形成的传统，不是照搬照抄过去的一切做法和制度，而是应秉承和发扬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努力提高教学科研质量的理念和精神，这是前人在实践中凝聚而成的经验，是值得我们珍惜并发扬光大的宝贵财富。

之所以要突出强调中国阿语专业历史传统中的亮点，是因为阿语专业与其他外语专业一样，当前都面临着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和教材体系的任务，坚持重视需要和重视质量这样的传统，无疑是建设中国特色阿语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探讨外语学科的中国特色，基本出发点，历来都是洋为中用。蔡元培说：“今后学人须具有世界知识，世界日在进化，事物日在发展，学说日新月异”。他之所以学日语，是他主张以日语为了解西方的桥梁。“因为日本翻译的西书很多，而且书价贱，能读日文书，则无异于能读遍世界新书。”^{[2]128}在办学指导思想，当年的西南联大提倡的是通才教育，主张加强基础知识的传

授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西南联大三校（北大、清华和南开）外文系的老师，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中外文双修，大都享有学贯中西——顺便说一句，在那时，印度哲学、历史、宗教、文化，也属西学之列，学贯中西亦即今日的学贯中外之谓——的声誉。他们不但能娴熟地讲授外语专业的语言、文学等课程，有自己的教材、专著，而且不少人还精通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文化，能作中外作品、作家的比较评析，并且结集成书。吴宓（1894~1978年）教授的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外语教育的理念：“外文系的学生不应满足于掌握的西方语言文字，还应了解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了解西方思想的众多流派，并且对中国的文学、文化也要有相当的修养和研究”。这也许可以看成是开创了中国外语教育精英培养模式的先河。

在新中国60年的外语教育史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曾多次指出，外语专业要抓住三个基本功：政治思想基本功、语言本身的基本功和文化知识的基本功。在当时政治运动频仍的情况下，他们仍强调要教学生懂得外国文化、文学、历史、地理等知识。因为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迅速发展，除了要把外国的信息、情况等及时翻译介绍进来，还得准确地把中国的政策主张、成绩成就等传播出去。外事工作者若上述三项基本功不过硬，显然很难胜任工作。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科教兴国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要学习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江泽民同志1993年4月在海南大学讲话中说：“要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就必须懂外文。”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主席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节里，更进一步提出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就对外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功能性要求，外语既是专业，又是工具，是中国了解世界、实现洋为中用的工具，又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国在海外软实力的必备条件。而在实践中，外语教育其实已经开始与文、理、农、工、医、政、法、财、经、管等学科不断地在交叉融合。这实际上乃是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后，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多年繁荣发展后，对外语教育学科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三、对新中国阿拉伯语专业在新世纪的发展展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阿语专业的发展之快，颇有些出人意料。据悉眼下已有20多所高校建立了阿语系，在校生多达千人，堪称盛况空前。这种数量增多、规模扩张的现象，无疑反映了“中阿合作论坛”建立五年多来中阿新型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也表明了社会对阿语人才的需求在上升。但我们也应看到，设立阿语专业的高校，情况很不相同，其中有部属高校，地方“211”大学和一般地方高校，也有民办院校。遵照温家宝总理在《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一文中提出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从长远看，我们不仅要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满足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校办得好坏，不在规模大小，关键是要办出特色”^[6]，各校的阿语专业恐怕都得从本身的情况出发，明确自己的目标和角色定位，在彰显特色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分类转型。

依我浅见，当前的高校阿语专业，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创建阿语专业已长达四五十年的高校，它们大都是部属高校或“211”大学，亦即重点大学，师资、图书资料、课程、教材、学位点、对外交流等资源较充足，理应承担“提高”的重任，重点培养高校师资、高级翻译或复合型人才（如双语、阿语加专业等）。是否能像前述西南联大那样，开展精英教育，出拔尖人才、一流人才、创新人才？这取决于在未来对学科布局、专业设置、教学方法进行改革的过程中，阿语专业及所在高校能否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做到学术发展与人才培

养的紧密结合。

大家知道，解放初期“学习苏联后重点发展单一的外语学院”，当时是出于应急需要，但“单一外语学科的外语学院在发展上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困难”^{[2]203}，最主要的是缺失人文通识课程，不具有综合性大学内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补充和交流，因而很难实行通才教育。好在国内的几所老牌外国语学院，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就已陆续向多科型大学发展，并依照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建立起了研究机构，今后随着教学与科研的结合不断深化，是有可能首先在研究生培养层面逐渐接近精英教育模式的。只是，与其他外语专业相比，目前阿语专业的制度性建设尚显滞后，如水平考试的开展远落后于其他语种，且程序性规范也还有待完善。事实上，水平考试和题库建设是中国外语教育在完成全国专业外语基础阶段和高年级教学大纲之后，积极推出的又一重大步骤。它不仅关系到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而且也有利于减轻教师负担，使他们能有较充裕的时间去从事一些科研工作。对重点高校的阿语专业而言，本文前面提到的“国家需要大量的研究东方问题、通晓东方语文的人才”一段话，尤应值得重视和铭记。因为，阿语专业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广博门类中，总是一个小专业，但作为一个大国，我们面临的研究在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格局变化中，作用和影响均趋上升的阿拉伯问题，却已越来越显迫切和重要，其内容和领域也越来越丰富和广泛。因此统筹兼顾阿语教学和阿拉伯问题研究，无疑是承担中国阿语教育的重点高校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必须彰显的重要特色之一。

第二类是近年才设立阿语专业的高校，其中有地方高校、“211”大学，也有民办高校，它们办学目的大都是基于中阿经贸往来日趋频繁，看好阿语毕业生就业市场；也有的是为满足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学习了解伊斯兰宗教文化的需要。这类学校的招生人数，增长得很快，可能已超过了前一类高校，但办学条件各异，水平也参差不齐。我没有调查，只能谈点希望：一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阿语毕竟是国际公认的难学语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若不是靠马坚、纳忠、刘麟瑞、马金鹏等一批饱学之士的认真引领和严格把关，又岂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合格乃至优秀的毕业生，及时满足国家的需求？听说有些高校聘有已退休的资深教授任教，这无疑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表现，因为这些老教师——其中有我的老师、同学和同辈——都拥有数十年的教学经验，语言基本功打得很扎实，能继续为阿语专业培养人才作贡献，实乃功德之举。但返聘老教师毕竟是稀缺资源，可遇而不可求。从长远计，各校还得关注在编师资队伍的结构和质量。当前，似应认真考虑控制规模和办学点了，以便腾出手来，好好抓一下队伍建设，特别是要高度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得尽可能为他们提供进修、深造或攻读学位的机会。马坚先生曾多次比喻说，学生要舀一碗水，教师得有一桶水；学生要打一桶水，教师得有一井水。因为只有“名师”才能出“高徒”。前些年，西南一所大学办了几年的阿语专业戛然而止，只怕就与师资队伍不无关系；二是希望新办阿语专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能扎扎实实地加强专业技能训练。学好一门外语，并不容易，要达到听说读写译五个方面的全面发展，更得勤学苦练，不下硬功夫不行，阿语尤其如此。中国外语教育历经60年的发展，走过了一段卓有成就的道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中国的外语教育是世界第一流的。^{[2]引文8}这也包括阿语专业在内，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专家学者都承认，中国的阿语水平在非阿语国家中名列前茅。可以说，从第一代阿语教师开始，语言实践应用能力强，就一直是中国阿语教师的特色之一。他们除了课堂教学，还经常担负各种各样的口笔译工作，且都胜任愉快。这与他们平时注重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的专业能力训练是分不开的。现在高校硬件都很好，但愿学风教风不慕虚荣，不尚浮华，而是沉静踏实，注意保持专业的传统特色，着重提高质量和绩效，以造福国家，惠及学生。

四、结语

行文至此，忽闻中国东方学的大掌门人季羨林先生仙逝。他在我心中，始终是执掌治学方向之舵、把握学术智慧之珠的东方学奠基人，我们的阿语专业教学、阿拉伯问题研究，当年就都是在他领导的北大东语系里，建立发展起来的。2007年12月，北大举办“刘麟瑞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拿到刘慧编写的《刘麟瑞传》一书，还是季老的亲笔题签。而纵目阿语学界，去年，北外的资深教授纳忠先生也已归真，他是早年留学爱资哈尔大学、为新中国创建阿语专业的元老之一，也是第一代阿语教师中最长寿的一位。现在，回顾新中国阿语专业的60年，追思那些曾经领导过阿语专业建设，直接参与培养阿语人才的先贤先辈们，我们不但要永远铭记他们的人格魅力、学识魅力和作出的贡献，而且也应珍惜和发扬他们创建的专业传统，保持和彰显阿语专业的特色，争取在新的历史阶段，再有所创新，有所进步，使我们的阿语专业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李振中. 学者的追求：马坚传[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 [2] 李传松，许宝发. 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 [3] 蔡德贵. 季羨林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 季羨林. 在北京大学马坚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R]. 1995-06-09.
- [5]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6] 温家宝.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N]. 解放日报，2009-01-05.

Creating Traditions and Demonstrating Characteristics ——On Arabic Language Major's 60 Years in New China

ZHU Weilie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China Arabic language major's growing history which raised from 1946, describes new China 60 years'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abic language major carefully, and prospects it's developments in the new century from a strategically advantageous position. New China's Arabic language major progress is beyond traditional religious and lingual scope, and as a part of China'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his discipline's contents are continuing to widen.

Key Words New China; Arabic Language Major; Tra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责任编辑：钮松)